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

□张思 金星晔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科技强国建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深刻把握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的丰富内涵，增强体系化攻关能力，赢得竞争优势。

近年来，技术进步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创新联动程度之深前所未有。在这一背景下，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加强创新合作、合力攻坚日益成为创新的主流和需要。同时应看到，当前地缘政治动荡不安，各种形式的“筑墙设垒”“科技封锁”愈演愈烈。从统筹发展和安全看，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越是具有战略性、基础性的产业和技术，越不能把产业安全、技术安全建立在外部体系之上，而应通过构建

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更好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

自主完备与开放高效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自主完备为开放高效提供重要支撑和安全保证，确保以我为主配置资源、设置规则、管控风险；开放高效是促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创新体系自主完备的内在要求。只有二者有机统一，我国才能在全球科技竞争和产业变革中掌握主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筑牢坚实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应围绕我国技术体系、产业体系和市场优势推进开放协同，构建以我国为重要组织者的全球分布式创新生态，在全球科技合作中提升科技生态组织能力。

比如，集成电路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的核心，是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先导性产业。在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集成电路产业被明确列为要打造的新兴支柱产业之首。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离不开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

国家创新体系。具体来看，自主完备主要解决关键核心技术不在自己手里的问题，电子设计自动化、核心工艺、关键设备、基础软件等决定集成电路产业底座和技术方向的环节，必须持续攻关、牢牢掌握。开放高效主要解决怎样把中国优势转化为全球竞争力的问题，在集成电路产业中的一般材料、工艺协同、测试认证等环节，可围绕我国技术架构和产业需求，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参与合作，并形成多节点支撑、多市场反馈、多规则接口的全球创新网络。自主完备和开放高效之间能否有效协同、顺利运转，关键取决于技术互译、合作互嵌、制度互通。技术互译将复杂系统拆解为可组合、可迭代的模块，使更多主体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协同优化，但协同必须建立在自主技术链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技术参照系；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产业共识、推动知识产权交叉许可、促进科研人才流动和长期科研合作，通过合作互嵌增强创新网络各环节的信任积累和抗冲击能力；同时，通过

高标准规则、公平竞争环境等降低跨国协作成本，稳定市场预期。

“十五五”时期，在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既不能走向封闭替代，也不能停留在一般开放，而是要以产业自主可控、能够主导全球创新生态为支撑，构建自主完备、开放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一是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链主企业和重大应用场景为牵引，加快打通设计、制造等关键链条，分类推进强链补链延链，培育若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和共性技术平台。二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在标准制定、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合规等领域，建设可预期、可验证、可复制的制度接口。三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以新能源汽车、智能终端等场景带动芯片和基础软硬件迭代，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中把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方案推向更大市场。

(来源：《人民日报》)

完善财税政策

服务广西智能经济发展

□朱四畅

7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提出要“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8月6日，自治区党委召开2026年度发展壮大智能经济专题协商座谈会，强调“集聚优质资源、链接东盟市场，让广西成为中国—东盟智能经济合作的‘桥头堡’”。财税政策是财政发挥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作用的工具，在引导资源配置、激励技术创新、培育产业生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以更优的财税政策服务智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须回答的重要课题。

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避免低效普惠补贴，将资金精准投向算法基础、算力设施、数据要素市场和应用场景示范等关键环节。2026年广西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三年安排450亿元支持以AI为引领的新质生产力发展”。财税政策应确保资金投向能够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

顺应极化与辐射并存的空间集聚规律。智能经济呈空间集聚特征，广西要依托面向东盟的区位优势和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打造智能经济集聚区。财税政策不能搞“一刀切”，应有选择地支持南宁等城市形成极核带动效应，同时辐射全区，形成“重点引领、多点支撑”格局。

构建财税政策支持体系

深刻把握时代发展要求

从国际看，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上升为国家战略，持续加大研发与产业化支持力度；从国内看，各地竞相布局，智能经济已成为区域竞争的新赛道。在此背景下，财税政策作为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重要工具，要主动适应智能经济的新趋势、新需求。

智能经济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强外部性等特征，其发展不能完全依赖市场自发调节，需要政府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攻关、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场景培育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基础理论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投入大、周期长、不确定性高，市场机制难以充分覆盖，迫切需要财税政策在分担风险、降低成本和激励创新上发挥更大作用。

当前，广西积极构建“北上广研发+广西集成+东盟应用”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推动“人工智能+制造”融合发展，打造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老挝、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布局海外分中心，落地了一批面向东盟的AI应用项目和标杆场景，智能经济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也要看到，广东、浙江、四川等省份已形成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和政策体系，广西面临不进则退、慢进亦退的紧迫形势。应紧扣智能经济发展要求，推动财税政策从普惠式扶持转向精准化赋能，从注重规模扩张转向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支持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更加注重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更加注重激发经营主体内生动力，这是务实选择。

遵循智能经济发展规律

智能经济作为一种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算法为核心驱动、以算力为重要支撑的新型经济形态，其发展演进具有自身的内在规律。深刻认识并自觉遵循这些规律，是构建与智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财税政策体系的基本前提。具体而言，要重点把握以下四个方面的规律性要求。

遵循技术突破与数据驱动的创新规律。智能经济的主要动力来自算法、算力、数据的协同创新，基础研究投入大、周期长、外溢性强，市场难以充分覆盖。财税政策应加大对基础算法研究、算力设施 and 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的稳定支持，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工具激励企业加大投入，建立竞争性 with 稳定性相结合的创新投入机制。

把握技术赋能与产业催生的叠加规律。智能技术既改造传统产业，又催生新兴产业链，二者协同演进。财税政策既要支持智能芯片、大模型、智能终端等新兴产业培育，也要支持制造业、农业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处理好破与立的关系，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效率标尺。智能经济的根本价值在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财税政策须从

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

为破解生态保护难题提供法治保障

□杨勇

生态环境法典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项重大成果。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努力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避免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着力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系统立法、整合升华，将我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积累的生态环境治理经验体系化、制度化，为解决生态保护难题提供了重要法治保障。

以系统观念为引领，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复合型生态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各类污染要素叠加、传统污染与新污染风险交织等问题凸显，构成复合型生态环境治理难题，迫切需要多领域协同立法促进解决。对此，我国以系统观念引领生态环境法典编纂，将四个维度的统筹考量转化为体系化的制度设计。一是应对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环境法典将大气、水、海洋、土壤等多领域污染防治法律制度集成纳入污染防治编，破解工

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污染防治法律碎片化、执法标准不一等突出问题。二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生态环境法典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三是注重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生态环境法典在明确国家层面统一规划的同时，规定“建立健全跨行政区域的重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联合保护协调机制”，构建起国家统筹、区域协同的治理架构，破解跨行政区域生态环境治理碎片化的体制性难题。四是着眼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生态环境法典规定：“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和绿色低碳发展”，为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提供了指引。生态环境法典通过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治理从单一要素管理迈向系统综合治理。

坚持民生为本，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如何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民生保障，是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对此，生态环境法典将“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确立为立法目的之一，构建起贯

通保障公众健康、公众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等各环节的民生保障制度。在保障公众健康方面，生态环境法典从标准制定、风险预警、污染防治等多个维度，将保障公众健康贯穿生态环境治理全链条，回应环境健康风险加大的民生关切。在公众参与方面，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享有获取生态环境信息、参与和监督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凝聚解决生态难题的社会力量。在生态保护补偿方面，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综合运用资金补偿、产业转移、购买生态产品和服务等多种方式，促进对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方面，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

深化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全球性生态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工业化、城镇化是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由此衍生的生态保护难题具有全球

性。生态环境法典从基本规定和重要领域等层面，就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作出体系化安排。在基本规定层面，要求国家加强生态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履行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积极参与生态环境国际规则的研究与制定。在重要领域层面，针对气候变化这一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紧密相关的重要领域，生态环境法典作出专门部署，将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意志系统转化为完整的制度链条。这一制度链条包含吸纳与贡献的双重逻辑。在吸纳方面，生态环境法典有机衔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核心义务，推动国际共识在中国落地生根。在贡献方面，“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在全球范围尚属首创，就应对气候变化、碳达峰碳中和作出原则性、引领性规定，彰显了我国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法治担当。通过持续深化国际合作，中国将与各国携手前行，为破解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的生态保护难题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并将继续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

(来源：《人民日报》)

以扩大优质供给推动消费升级

□顾雷雷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了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7月底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推动消费升级，既是破解供需结构性错配的现实需要，也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选择。

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推动供需适配，促进生产供给端主动适应消费趋势变化，在质量、结构、效用等方面动态精准匹配多元消费需求，才能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进而在二者的动态平衡中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当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3万美元，消费需求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品质化、个性化、多样化特征日益鲜明；同时，部分领域供需结构性错配问题依然存在，一些潜在消费需求难以有效释放。破解这一矛盾，既要靠需求侧的引导，也要从供给侧主动作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优质供给引领和创造需求，推动

消费扩容升级。围绕这一目标，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比如，去年发布的《关于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进一步促进消费的实施方案》提出5个方面的举措，正是为了增强供需适配性，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在一系列措施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1个百分点，持续发挥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作用。随着技术迭代升级、供需更好适配，更多新的商品将进入消费市场，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带来新的消费增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为进一步推动供需适配指明了方向。“适应不同群体”体现了施策要精准，意味着要区分不同地区、不同收入、不同年龄层差异等，避免“一刀切”；“扩大优质供给”是路径，通过提升商品与服务质量，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消费。落实这一要求，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服务消费扩能，健全促进供需良性循环的政策体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使内需真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稳定锚，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提升商品供给质量。高质量的供给，能够开辟新的消费场景和需求空间。比

如，近年来即时零售等新业态依托数字技术重构消费方式，成为零售业增长较快的板块之一；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推动下，新能源汽车、一级能效家电等绿色智能商品成为消费者的普遍选择。这表明，供给侧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能够为消费扩容升级注入内生动力。在实践中，应以科技创新为支撑提升供给质量，一方面，推动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前沿技术与消费品工业深度融合，改造提升食品、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破解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智能穿戴、服务机器人等领域创新成果产业化，使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优质商品供给不断丰富。

培育服务消费新优势。服务消费具有高频次、强体验、长链条的特征，已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重要动力。从“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到博物馆延长开放带来的“博物馆奇妙夜”，再到冰雪经济、银发经济的蓬勃发展，既表明新的服务消费场景通常能够转化为现实的消费增长点，也体现出优质供给的重要价值。提升优质服务供给，一方面，要深入实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放宽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旅体育

等领域市场准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扩大优质服务供给总量；另一方面，要健全服务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加快养老护理、婴幼儿照护等专业人士培养，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升级，以优质供给的不断扩容支撑服务消费持续增长。

拓展优质供给新空间。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直接丰富居民的消费选择；稳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能够以开放促竞争、以竞争促提质，推动国内服务供给升级。比如，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吸引15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与，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额达834.9亿美元，一大批全球优质消费品经由这一平台由展品变为商品进入中国市场；随着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大和离境退税“即买即退”服务推广至全国，2025年入境外国人超过8200万人次，“中国游”“中国购”热度攀升，入境消费正在成为内需增长的新亮点。在此背景下，进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关税和制度性交易成本持续降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深入推进，扩大开放与促进国内供给升级正在形成内外联动、竞争有序的良性互动格局。

(来源：《人民日报》)